

## 評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xv + 310pp.

蔡松穎\*

在 1990 年代以前，由於戰地政務體制的存在，對於金門歷史多集中於方志類型的書寫。即便是戰地政務體制解除後，金門當地的文史工作者興起了對於原鄉研究的熱潮，但符合現代學術規範的「金門史研究」著作也仍不多。<sup>1</sup>楊肅獻主編的《金門近代史》和謝重光等人所著的《金門史稿》是少有的金門史研究專書。《金門史稿》著重於 1949 年以前的金門史研究，對清以前的時段研究尤為詳盡，<sup>2</sup>《金門近代史》則是大量使用了方志、《顯影月刊》與《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等史料，分別從政治、經濟、社會、反抗運動等主題出發，述說民國以來的金門史。<sup>3</sup>

作者宋怡明(Michael Szonyi)的博士論文為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結合了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法，藉由福州的宗族來探討民間地方策略的運作與形

---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sup>1</sup> 楊肅獻，〈金門史的研究與書寫〉，收於李沃士等著，《2010 第三屆金門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0），頁VIII-X。

<sup>2</sup> 謝重光、楊彥杰、汪毅夫著，《金門史稿》（廈門：鷺江出版社，2003）。

<sup>3</sup> 楊肅獻總編，《金門近代史》（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頁237-238。

式。本書與 *Practicing Kinship* 有很多相似之處，像是作者依然採用了人類學與歷史學並行的研究法，在大量使用口述史料的同時，仍保有歷史學對於時空變化的敏銳度；又或者對於地方策略的強調，也依然是本書的主軸之一。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學思的延續性。

和過往對金門史的研究相較，本書最大的特色在於理論性很強，作者試圖以「軍事化 (militarization)」、「地緣政治化 (geopoliticization)」、「現代化 (modernization)」和「記憶 (memory)」等四個抽象的核心概念為骨架，建構起 1949 年後的金門歷史。四者間交互影響的同時，也在金門人的生活中留下無所不在的痕跡。軍事化，最主要體現在 1956 年後金門被劃為「戰地政務區域」後。到 1992 年解除戰地政務為止，雖然同時仍有縣政府等一般行政組織存在，但「戰地政務委員會」和軍隊的領導者才是真正握有實權者，雙方互相依存，卻也因此而時有衝突 (頁 26-27)。以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防止匪諜滲透為目的而設置的戰地政務，將人民作為假想的、抱有叛亂意識的潛在敵人，因而百姓同時具有「國民」和「敵人」的二元身分，並受到無孔不入的監視及軍法的嚴密管制 (頁 31)。島上的生產、生活作息等都受到軍事化的影響，而強制動員的「民眾自衛組織」更成了金門人的新義務。

然而，在金門實施軍事化的目的，除了作為日後反攻大陸後該如何統治的實驗場外，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因應國際局勢而生。所謂的地緣政治化，就是把金門人的生活 and 全球政治連結在一起 (頁 3-4)。對於世界來說，臺灣海峽兩方的戰爭並不只是中國的內戰，同時也是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冷戰熱門的競技場之一，而金門正是這場對決的前線。因此各國——特別是美國這個超

級強權——的意向，便影響著金門的命運。像是1953年金門重新設立縣政府，作者認為一方面可能是因應韓戰爆發，另一方面是因為中華民國知道想要獲得美方援助，便要先讓自己成為「自由」的象徵，因此讓金門擺脫軍政專制的形象便成為必要之務（頁27）。而1954年之後中華民國向金門大量增派兵員，也是為了讓美國知道金門的重要性，並讓此處的陷落成爲冷戰中自由陣營無法承擔的損失，進而令美國加以協防（頁48）。

當戰火逐漸冷卻成爲一種表態，金門島上的冷戰進入了另外一種層次——宣傳戰。因爲地緣政治化和軍事化兩者的共同利益關懷，使得1960年代金門有了現代化的契機（頁81）。在冷戰中，「現代化」也成爲一種能動搖對方陣營的「武器」，這令軍方對於現代化有了興趣；與此同時，作爲一個延攬西方世界支持的「自由堡壘」，金門也有著現代化以示自由的需求，兩者結合之下，才令金門的現代化成爲可能。這種現代化是奠基於軍事化上的，因此，「強調衛生」一事便以動員軍、民捕捉老鼠的形式呈現，經濟力的提昇也立足於軍隊相關產業的發展上。或者可以說，金門的現代化是由軍事化所推動的。1949年以後，金門的發展便由國家掌控，而與世界失去聯繫，但受限於戰地政務，金門的經濟沒有像臺灣本島一樣創造奇蹟。而金門的中產階級也未像本島一般，積極參與政治轉型、民主化、去軍事化等轉變。即便如此，推動金門現代化的另一股力量——地緣政治，在1990年之後令戰地政務解除，使金門不再高度仰賴軍事經濟，終於再次帶動了金門的轉型。

無論是軍事化、地緣政治化抑或現代化，這三者都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金門人民的生活，同時，也影響了金門人對這些過往的記憶。作者在本書中大量地使用了口述史料，他的目的不在於透過這些史料來還原某種真實的過去，而是藉此來了解金門人

的記憶是如何被塑造、保留的。因此在本書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人民記憶和官方大相逕庭之處，像是記載中的 823 砲戰，人民死亡人數只有 140 人，但是人民對這場砲戰的主要記憶還是圍繞著「死亡」（頁 68）；又或者對於軍隊搜查共匪的行動，人民卻多是記得軍人往往藉機順手牽羊（頁 34），這些都印證了人民有著不同於官方版本的記憶。此外，作者還發現在這些口述史料中，不同居民對同一事件的敘述常呈現高度的一致性。作者認為，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本身會決定哪些事物該被記得，通常是有象徵性或展現光明面的事件，以免人民在灰暗的記憶中過於痛苦；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與官方的糾紛中，大多數人民的立場是一致的，特別是那些能獲得賠償的糾紛中更是如此（頁 225-226）。

除了以軍事化等核心概念為金門史開創了嶄新的解析面向外，作者也試著將金門史放進更大的脈絡中，好作為其他研究的借鏡。第一是可作為 1949 年以後臺灣政局和經濟發展的一種觀點，臺灣雖然在戰後受到美國的大力干涉，但是在發展上仍有自身的內在動力，而從金門的變遷和金門人對臺灣的觀察，都可以看出當時臺灣政策、局勢變化的走向。第二是可以作為 1949 年後中共政策的對照組。兩岸領導者的個人特質、政權中的官僚政治，以及用鋪天蓋地的意識型態作為統治手段等等高度相似的特色，都說明了中國在 1949 年以後的很多現象必須由兩岸共通的歷史背景（像是兩岸政黨的前身都是列寧式的現代革命組織）來解釋，而非突發的偶然。就像東、西德一般，兩岸並非各自獨立發展，而是彼此參照、刺激，進而有如鏡象般地向前邁進（頁 251-252）。第三是可以作為其他高度軍事化社會的參照。冷戰中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很多地區的現代化都帶有軍事化的特質，是軍事化擴展到社會生活後的一種現象。軍事化影響了這些地區了解、發展現

代化的途徑，這在南韓、南越和臺灣皆是如此。金門的特殊發展歷程，正好作為一個例子，提供這些地區研究的參照。

但是，本書同時也提醒著我們，在這些巨大的脈絡下，金門人並非木然、被動地承受這一切，相反地，他們具有很高的能動性（agency）。他們的對於種種不公所表現出來的「沉默」，並不是外人可以用來譴責他們的理由，實際上，他們很可能隱約地察覺了社會中的權力分配，進而以政治的、對抗的方式做出回應。這點在他們的記憶中尤為明顯。在他們「反抗的記憶」裡，自身往往是事件的核心，對壓迫者做出抵抗。這些抵抗絕非如過往研究所言，從 1980 年代的政治抗爭行動才開始，而是自始至終都存在的。而國際間對金門的高度矚目，也讓他們藉由參與「國際事件」來定位自身的價值，成為自我認同的一部分（頁 246-248）。地方人民的能動性和地方策略，近來屢為學者所強調。如華琛（James Watson）便認為在中央政府對地方宗教實施標準化之餘，地方人民也因自身需求而對中央的規定做出變化，而非一味接受；<sup>4</sup>康豹（Paul R. Katz）也透過對寺廟、儀式的研究，揭示在宗教層面的話語權爭奪裡，地方菁英與神職人員是能相互抗衡的；<sup>5</sup>羅士傑對溫州的研究中更顯示地方政治實由地方菁英主導，政府在此是相當無力的。<sup>6</sup>然而，正如 William H. Swell 所指出的一般，縱使每

---

<sup>4</sup> James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David Johnson et al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292-325.

<sup>5</sup> 康豹，〈中國帝制晚期以降寺廟儀式在地方社會中的功能〉，收於林富士主編，〈中國史新編：宗教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375-412。

<sup>6</sup> 羅士傑，〈地方神明如何平定叛亂：楊府君與溫州地方政治（1830-1867）〉，收於吳松弟、連曉鳴、洪振寧主編，〈走入歷史的深處：中國東南地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432-448。

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施展自身能動性的空間，但在不同的社會系統下，人們能做到的程度和內容也大不相同。<sup>7</sup>不同於明清傳統帝國中的任何區域，1949 年以後的金門是一個現代國家治下的小島，且受到政府的高度關注。在政府掌控力相對高漲且無孔不入的情況下，金門居民能發揮的能動性其實相當有限，即便居民試圖在宗教場域和官方爭奪話語權，他們也無法因此在官方手下攫取多少權力。作者對於居民反抗、能動性的強調，雖然讓我們見到了居民們如何利用各種象徵、脈絡、甚至地緣政治作為工具，但反而更凸顯了此時期官方政治力量的強大以及居民對改變現狀的無力。

綜觀全書，作者藉由軍事化等四個主軸替金門史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解讀，並讓其擁有了與其餘研究對話的平台，著實令金門史脫離地方研究的侷限，提升到更大的脈絡中，賦予了金門史研究新的價值，可謂是一新典範的樹立。與之相比，《金門近代史》雖能讓讀者清楚地對民國以來的金門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且也用訪談錄來補足官方材料的偏頗，但本書卻更進一步地為金門的發展提出了這四條主軸，並將金門史放到了更大的地緣與學術脈絡中；而張淑雅則是從官方的角度出發，細緻地分析臺、美政府的決策制定，並未及於人民的觀點。<sup>8</sup>從觀察面向來看，本書確實

<sup>7</sup> William H. Sewell, Jr.,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 (July, 1992), pp. 20-21.

<sup>8</sup> 可見張淑雅，〈美國對臺政策轉變的考察，1950年12月—1951年5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臺北，1990.6），頁469-486；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6（臺北，2001.12），頁231-297；張淑雅，〈「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八二三砲戰與「反攻大陸」宣傳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0（臺北，2010.12），頁1-49；張淑雅，〈臺海危機前美國對外島的政策（1953-195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下（臺北，1994.6），頁293-330。

較前人研究更為全面。

作者書中這四條主軸一方面是從金門當地的歷史中所歸納得出，另一方面也是延續學界既有關懷而生的幾個面向。如軍事化原本是用以強調國家增強力量以備戰的過程，以及人們的價值觀與行為如何一步步往軍隊靠近。相較之下，作者在本書中較為淡化了國家決策層面的角色，而是強調軍事化對當地社會帶來的衝擊、和軍方的利益、價值觀與論述是如何滲入金門社會的（頁3、260）。這樣的選擇讓作者能更有效地體會當地人的心境，並從該處出發去講述一個屬於這些人們的故事，而非定於一詞的官方說法。作者雖未明說，但這與人類學強調當地觀點（native viewpoint）的取徑是相互呼應的，<sup>9</sup>再次顯示作者將歷史學與人類學結合後所作出的突破。又如地緣政治學是從地理與空間去了解國家、政治的一個學門，其中又因側重面向的不同而有許多流派。<sup>10</sup>而作者雖未直接引用這些學術理論，但其所採取的觀點則較接近從國際政治結構的角度出發，由此來理解、分析當地的社會政治結構。<sup>11</sup>而作者別出心裁地將這種視野與另一個主軸——「記憶」相結合，讓我們得以見到地緣政治是如何成為金門人了解自身經驗的重要框架，以及這些政治事件是如何在記憶中被轉化的。

這些由作者口述所得的「集體記憶」是四個主軸中最特別的一項。作者所用的史料，大致可分為「檔案」和「口述」兩類。前者在使用最多的是小金門（烈嶼鄉）檔案，而國防部、國史館與警察局的檔案都只佔寥寥數則，主要只是用來重建官方的視野

<sup>9</sup> 科塔克（Conrad Phillip Kottak）著，徐雨村譯，《文化人類學：領會文化多樣性》（臺北：麥格羅西爾，2014），頁71-72。

<sup>10</sup> 孫相東，《地緣政治學：思想史上的不同視角》（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5），頁6-7。

<sup>11</sup> 孫相東，《地緣政治學：思想史上的不同視角》，頁168-169。

以及其所採取的統治手段；而後者則用來表述當事者（主要是百姓）對於該事件的想法，以及這些記憶如何被構築。這種處理法一方面補足了官方歷史書寫中平民不易發聲的遺憾，使得歷史和政策不再是單向的由上至下，而是強化了人民的能動性，使其脫離被動的角色；另一方面也不像過往研究般將口述史料作為史實的根據，成功地免除了讀者對於「口述史料可信度」的疑慮。因為作者無意探討口述史料究竟能傳達多少史實，而是先行承認記憶的被建構性，再進而解析這些建構因何而來。

這種對於「記憶」的理解，受到 Maurice Halbwachs 很深的影響，特別是在「集體記憶」的部分。Halbwachs 認為，人們在溫習自己記憶的時候，會受到自己現在的興趣和觀點所影響，而讓記憶中的不同部分強化或減弱。因此經過生命中的不同階段，記憶便會一次次受到不同時期的觀念系統所影響，而與最原始的樣貌大相逕庭。<sup>12</sup>這些觀念系統來自於自身所屬的群體，當我們回想某件事情的時候，其實是透過某個群體的思想邏輯來了解、評價那段回憶，這才讓這段回憶的內容有了定位和意義，因此即便是個人的記憶，其實也是集體記憶的一部分。而也是因為個人記憶其實仰仗於群體邏輯來定位，所以同一個群體內對該段事件的記憶往往會有高度的一致性。<sup>13</sup>作者對於金門人記憶的理解，與此一脈相承。

然而，這種觀點亦有其限制。如 Barry Schwartz 和 Lewis A. Coser 便認為：Halbwachs 過於強調歷史記憶是被不同時代所詮釋出來的，不同時代對同一事件的理解因而有著斷裂，使得這種看

---

<sup>12</sup> 哈布瓦赫 (Halbwachs, M.) 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82。

<sup>13</sup> 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頁92-94。

法並不能解釋歷史的連續性。<sup>14</sup>這個問題帶給了作者同樣的困境——作者若是只用現代人的歷史記憶，試圖反應現在金門的處境，而對於過去金門的歷史，則是用這些扭曲後的記憶以及檔案資料來補強。但，這一方面會使得他的研究無法深入那些 Halbwachs 所說的、被集體記憶框架所忽略的那些「遺忘的記憶」；<sup>15</sup>另一方面則是在「歷史事實」的了解上，仍然無法突破檔案的限制，因為口述材料僅能反應受訪者的價值體系，而對了解過往的真實沒有幫助。作者並非未意識到這點，正如他在〈戰火下的記憶政治：金門，1949-2008〉一文中所說，雖然必須將集體記憶放到更大的脈絡中去理解、詮釋，但作者「仍希望強調集體記憶具有慣性（inertia）的特性。也就是說，記憶論述的創造有其侷限，它並不能全然超越既存的個人與集體記憶。」<sup>16</sup>這種認知突破了 Halbwachs 論述中的缺陷，令集體記憶的原始樣貌得以浮現。而金門人在歷史中的面貌，也因此而更為明顯。

簡而言之，本書為金門史研究樹立了新的典範。此後對於金門史的研究無法再滿足於單純對史實的描述而已，勢必得將金門史與更大的脈絡結合。2012年成功大學在金門召開的金門學研討會中，鄭振滿、陳春聲、陳支平、丁荷生等華南學派的學者便試圖將金門史與中國的鹽政、海外華人宗教等結合起來，以期更進一步地解讀金門的過去，可見得對於金門的史學研究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sup>17</sup>此後對於過往的重建，也不會只停在官方檔案給

<sup>14</sup> Lewis A. Coser 著，畢然、郭金華譯，〈導論 莫里斯·哈布瓦赫〉，收於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頁49。

<sup>15</sup> 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頁289、304。

<sup>16</sup> 宋怡明(Michael Szonyi)著，李仁淵譯，〈戰火下的政治記憶：金門，1949-2008〉，《考古人類學刊》，74（臺北，2009），頁64。

<sup>17</sup> 鄭振滿，〈明代金門的制度變革與社會轉型——以鹽政改革為中心〉，收於陳溢源

出的影像，而是更為看重民間的聲音與行動。此外，金門的豐富口述材料對於研究者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寶庫，關於金門史中「記憶」與「史實」間的交互辯證，也會在本書之後延續下去。<sup>18</sup>對於後續研究者而言，固然可以在本書時間斷限以外做出延伸研究，亦可以試圖挖掘出新的脈絡，或是和對臺灣本島的研究相結合，描繪出更為全面的圖像。但是無論如何，本書的研究都提供了一個很穩固的出發點，且未來研究者無論贊同與否，都無法迴避本書的論述。就此而言，本書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

---

主編，《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成大人文社會科學中心，2012.12），頁175-188；陳春聲，〈在禮法正統與政治現實之間——魯王在金門活動及相關歷史記憶的研究〉，收於陳溢源主編，《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89-206；陳支平，〈清末鹽政浯洲場公牘匯鈔述略〉，收於陳溢源主編，《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23-234；丁荷生（Kenneth Dean），〈海外華人廟宇、商業信託網路與金門（Overseas Chinese Temple and Trust Networks and Jinmen island）〉，收於陳溢源主編，《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533-577。

<sup>18</sup> 雖未有專著，但已有學位論文是針對這方面主題而生，參見呂靜怡，〈「出操」的記憶與認同——金門婦女隊員的生命經驗敘說（1949～1992年）〉（花蓮：慈濟大學人類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